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五、选编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们水平不高，经验不足，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，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农民家史

阎王债

逼命的地租

含泪闯关东

长工苦

抓丁仇

万恶的族权

打不赢的官司

夺地

三辈创业记

难过的年关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7

定 价： 0.11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地租重如山	(3)
佃戶的沉淪	(11)
運命的地租	(27)
三代苦難	(33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五、选编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们水平不高，经验不足，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，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地租重如山

从前有句民謠：“农民身上两把刀，租米重，利錢高。”真是一点不假。在旧社会，我家就是被这两把刀逼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。

涨 租

我現在是辽宁省复县松树公社茶条房大队的社員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便跟着爹媽搬到了呂家沟。我家一直租种忠和堂大地主王书林的五亩地。这点地一年只能打三四石粮，可是租子却要了两石，为了糊口，一家大小只得拚命苦干。沒有牛轡就用鋤头刨，沒有車就用肩膀挑。肩上磨出了紫泡，汗水順着脖子往下流也不敢放下糞担。体弱多病的母亲，順道拣石头，生怕碰着我爹和我的脚，因为我們总是赤着脚干活。春天一解冻，全家老幼就起早貪黑地扛着鋤头，拿着铁鍬，在偏坡六棱的沟帮上开荒，刨一下，当啷一声。不分寒冬、酷夏，也不管肚子餓、头发暈，鋤头总是不离手。有一次，十八岁的二姐赤脚开荒，脚碰得鮮血直流，疼的她干一气，哭一气。就这样經過十多年不分黑夜白天的劳动，我們一家才开出了六亩荒地，买了一头小牛，日子才松快了一点儿。

这时候，我已經二十七岁了。这一年秋天，庄稼收成还不

錯，一家人正在高兴地吃午飯，忽然地主打发人把我叫走了。

忠和堂大地主王书林，是当地出名的大恶霸。每年雇用的伙計不算，光給他种田的佃戶就有二十多家。头年王书林得病死了，又找了个管家于宝学。这小子比王书林还狠毒。附近的人当面称他“于先生”，背后都叫他于坏蛋。

我进了忠和堂的院子，只見厢房里十四五個佃戶，有的昂着头，气哼哼地瞪着牆皮不說話；有的蹲在屋角下愁容滿面，唉声叹气。于坏蛋坐在桌子前面，面色灰嗆嗆的。我忙問：“什么事，于先生？”

于坏蛋瞪了我一眼，拿起算盘拨拉几下，一摞說：“今年你們租子四石三，知道嗎？”

我一听火窜头頂，便反問他：“地租不是早就定下了么？怎么到秋后又变卦了呢？再說，从古至今也沒有这个时候涨租的呀！”

于坏蛋把三角眼一瞪，冷笑道：“东家的地願什么时候涨租就什么时候涨。不願种可以，有的是种的！”

“一共才五亩地就要四石三斗租子，都給了你們也不够呀！”

“五亩地？”于坏蛋笑了两声說：“几亩地你心里明白！你們开的那些荒地就不打粮啦？”

我說：“那荒地是我們自己开的，怎能算东家的地！”

这工夫，躺在炕上抽大烟的、王书林的叔叔王希朋一下子跳起来說：“你們随便开地还有理啦！地皮是你們的嗎？把地契拿出来給我看看！”

听了他的話，我气得肺都快炸了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穷人

有理也白搭，我只好說：“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！”于坏蛋說：“告訴你老子，明天就来交租！晚了我們就抽地！”

我回到家里一說，真象个晴空劈雷，震得一家人再沒有心思吃飯了。依着我的意思，这份地就不种了。可是爹說：“不种咱吃什么！”

父亲是个經得多、見得广的老人，从我記事那天起，父亲已經換了五个东家，搬了五个地方。但任何一个东家，任何一个地方，都一样剝削压迫穷人。最后全家核計是火坑也得往里跳，地还是得种。就又向地主去求情，不知說了多少好話，才把四石三的租子改成三石五。

租子涨了，家里的生活更沒法儿过了，爹和媽赶紧打发两个姐姐出了門子，我除了种自己的地，还要隔三接五地到地主家扛活做月。不久，媽媽經不住生活的煎熬，就含悲飲恨地死去了。

夺 牛

几年过去了，幸亏雨水調和，加上我們一家老幼的穷奔苦熬的劳动，才勉强过上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。但是，到了一九四一年，天气干旱的厉害，我家又遭到了灾难。这年秋后，地里打的粮食不够往年的一半，可是于坏蛋照样押着两辆大車来收租。我哀求他說：“于先生，今年旱瞎了，租子不能按数交了。”于坏蛋說：“少廢話！”說着就叫伙計用自带的大斗，一斗一斗地往口袋里装，装到三石时，囤子光了，于坏蛋問：“缺的五斗怎么办？”

我又气又痛，說：“穷，穷个干淨！”說着就到屋里把囤底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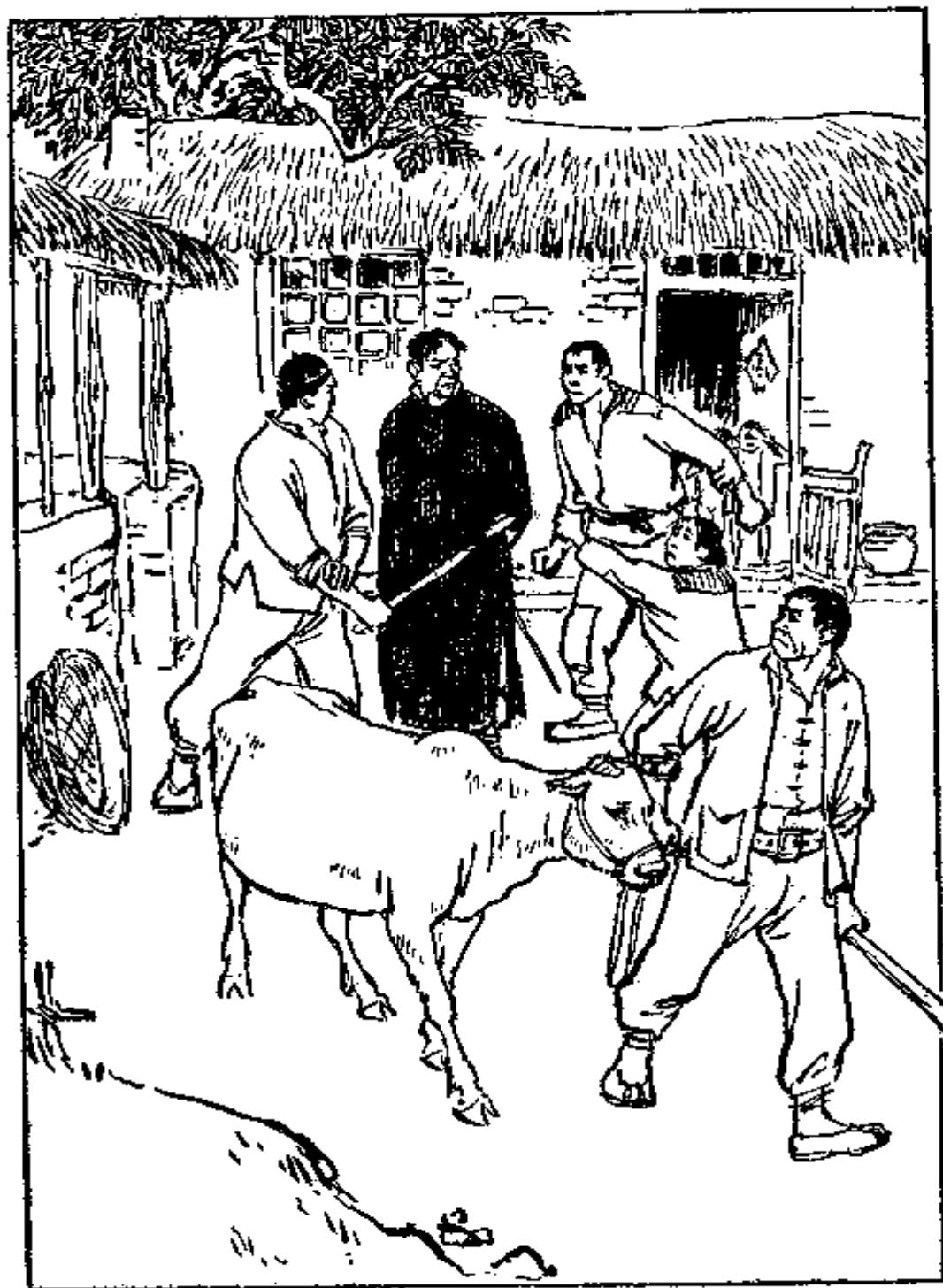
了又扫。一个囤底再扫也扫不出五斗粮呀！最后好歹装满了一斗给了他。于坏蛋冷笑着说：“下剩四斗给你记上账啦！”

粮，一粒没剩，全部拉走了。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呢？我象钉在地上，似的一动也不动。年老的父亲看着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全给地主拿光了，心里非常难过，躺在炕上不说话，也不愿吃饭，又加上有病，这年腊月十九就死去了。父亲这一死，我家的生活更加贫困了。为了活下去，我被迫又向地主借了一石三斗粮。这一借不要紧，我就象叫毒蛇缠住了似的，怎么抖擻也抖擻不下来了，直到第二年新粮下来也没还上。

转年秋天，我在外边听别人说：在很远很远的南方，有一帮人叫“均产党”，他们打地主，分土地，房子和东西也分给穷人。我心里很高兴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就讲给一家老少听，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听见了，拉着我的手，嚷着要我把家搬到那儿去。我们正谈得起劲，忽听外面有人喊：“侯万顺在家吗？”我忙收起了笑容，赶出去。一看是地主儿子王少武，他手提大棒，后边还跟着两个打手，气势汹汹地走进院来。我知道事情不妙，赶忙迎上去说道：“少东家，进屋坐。”

地主阶级真是一辈比一辈狠，一辈比一辈毒，王少武一走进门，便指着我的鼻子喊道：“你欠的债，如今钱不到，人也不到，你想怎么的，嗯？”

我压住了心头怒火，忙说：“少东家，别这样，不看别的，还得看看我家这些孩子！”炕上的三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，都赤身露体，围着一床又小又破的褥子，吓得死死盯着地下拿棒子的三个凶神恶鬼，谁也不敢哭叫一声。两个打手在屋子里又桶又翻，弄得到处乱七八糟，也没找到一点值钱的东西。最



王少武走出門口，往牛棚里一指說：“把牛赶走！”

后王少武走出門口，往牛棚里一指說：“把牛赶走！”

牛，这是我家的命根子啊！夺走牛就是夺走我們的性命啊！我急忙过去夺繩。王少武上来就把我推了个大跟头。我妻子赶出来向他哀求也不行。他們搶的搶，夺的夺，把牛赶出了大門。我見牛被搶走，也真急了，瞪着眼对王少武說：“王少武，你太欺压人了，連口气都不讓我們喘啊！”王少武得意洋洋地說：“让你们喘气？你要喘了气我們喝西北风去？”就这样，才一年多的時間，地主的馱打滾利，又把我家的牛給夺走了。王少武走了以后，我觉得他欺人太甚了，决心要去告他。

邻居們听說我要告王少武，都来劝我說：“算了吧，这个世道你和有錢人打官司，那不是鸡蛋碰石头！王少武又会說鬼子話，到衙門口象走平道一样。俗話說得好：衙門口朝南开，有理无錢別进来。”

我听了这些話，难受得眼睛都直了。心想，这是什么世道，穷人哪天才不受有錢人的欺負啊！这时，十三岁的大儿子，拉着我的手說：“爹，咱找‘均产党’去！”儿子的話，使我滿腹无处訴的冤气，消了一半，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窝，我想，要真的找到“均产党”就好了。

坐 牢

一九四五年秋，日本鬼子倒台了，“均产党”也真的来了，但是不叫均产党，而是叫共产党、八路军。共产党来了以后，区里的曹区长召开穷哥們会，給大家讲鬧革命的道理，我会会不漏，句句記在心里，越听越高兴，越听越有劲。后来大伙又

选我当村长，领着穷哥们清算了地主，分了青苗。我那头被地主夺去的大牛虽然卖了，也清算回来两石粮。

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，分土地，打倒封建剥削；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心要打内战，消灭共产党，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。一九四六年冬，地主依靠国民党的势力又凶起来了，到处反攻倒算，捕抓革命干部。可是这回我没害怕，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。这一天，是腊月二十八，我手提粪筐，刚要走，却被两个便衣特务抓住了。先是押到伪屯长家逼问，我一口一个不知道。两个特务用筷子夹我的手，打得我鲜血从两个嘴角直流，但是我什么也不说。后来又被押到监狱里。一个只能坐十六个人的小屋，放进四十个人，排着两行，肩对肩，腿插腿，谁一站起来，再要坐下去就费老劲了。

我住了七十天的监牢，被审讯了四次。每次国民党的审讯官都是拍着桌子问：“你们都谁算账来？”不管国民党怎么凶，我始终是那么一句话：“不知道”。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会轻饶我，每次都把我打得皮开肉烂。

有一次，他们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东家的大牛？”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那是我家的大牛，怎么不要！”

国民党审讯官冷笑了两声说：“岂有此理，哪有有钱人去要饭的筐里拿饼子吃的！”

我又顶了一句：“有钱人才不干人事哩！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啪啪又是一阵皮带，打够了才不耐烦地说：“带下去！”

可是就在这工夫，辽南形势变化了，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解放军打败了，当官的只顾逃跑，无心再审问犯人，才把我释放出来。

我出了牢獄，已被折磨得不象人樣了。家里被国民党和地主遭害的也是要啥沒啥，清算回来的两石粮食，也叫地主給反攻倒算回去了。

新 生

天变了，共产党第二次来了。斗地主、打恶霸，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。干坏蛋被定为坏分子，斗争后交给群众管制。王少武当时虽然跑了，可是一九五一年“鎮反”时，又被人民政府从沈阳抓回来，依法判处了无期徒刑。

我家几辈子的苦水倒淨了，分回来一头大牛，原住的地主三间房子也分给了我，原来租的五亩地和六亩开荒地也还了家。我怎能不感谢共产党，怎能不感谢毛主席！

但是，阶级敌人并没死心，他们总还想重新骑到我们头上来。因此，为了保卫我们的江山，在一九五四年扩军时，我就叫大儿子参了军。现在除大儿子在外边，家里有八口人，四个劳动力，生活过得很好。生产队看我年龄大了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总不叫我干累活，可是我闲不住，并且常跟他们说：“一想旧社会受的那份罪，一对照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不但不感觉累，有时还感觉劲使不完呢！”

侯万顺 口述

葛仁明 整理

选自辽宁省《复县家史选》

佃戶的仇恨

我家原住在安徽省霍丘县城西南七十里的侯老庄。解放前沒房沒地，世世代代不是給地主当长工，就是租地主的地种，成年累月受苦受累，到头来，却是“粮食登場，眼泪汪汪，东家租子刮干净，卖儿卖女去逃荒！”不但如此，一家人还不断的被逼死、打死、餓死。

明知虎吃人，还要钻虎洞

我爷爷叫王万，从十三岁起，就给人家当长工，干了二十年，連一件棉衣都沒落到。在他三十五岁那年，天旱不雨，草籽无收，不知有多少穷人，死在这荒年之中，也不知有多少穷人，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儿女。就在这一年，爷爷为了活命，借了地主陈晓崗五串錢。借了地主的錢，就得按期还。当长工的人，連嘴都糊不住，哪来的錢还賬啊！无奈何，爷爷和奶奶就给陈晓崗当了五年不要工錢的长工，抵消了这笔債。

在爷爷四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已先后生下了我大伯、父亲、叔叔等。这时爷爷想：吃飯的人口多了，光靠当长工活不下去，不如自己租点地种。他千求万告，总算租到了陈晓崗的一百亩薄地。租地主的地，就得受地主的剝削，起初三成，以后改为五成，一年的辛勤劳动，只能落个搶場飽。爷爷对地主的

剝削，非常憤恨，但又覺得总比逃荒要飯多少強點，就這樣，一直干了十年。

到我四歲那年，碰到大旱，地里什么都沒收到。一家人正在傷心流淚，发愁以后的日子沒法過，突然地主陳曉崗揮着文明棍，帶着狗腿子來了。他進門就喊：“王萬，秋收了，你為什麼不交租？”天哪！連種子都沒收到，哪有糧食交租呢！爷爷先是向他求情，后又和他爭辯說：“天不收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？”这下可惹恼了地主陳曉崗，他把手一背，臉一沉，喊道：“給我狠狠地打！”說着狗腿子們的棍子、拳頭、脚，象雨點一樣落到爷爷身上。年老的爷爷被打得昏倒在地，好半天才蘇醒過來。

爷爷被打以后，連傷帶病，臥床不起，几个月以后，就离开了人世。臨死時，他把全家人叫到身邊說：“孩子們，要記住我是怎麼死的……！”窮人家死了人，既沒有棺材，又沒有坟地，只好用秫秸捆住尸体，葬埋到乱坟崗上。這一年，奶奶也餓死了。

爷爷死后，地主陳曉崗抽回了佃地，还把我家赶出了庄。那時，我家有二十口人，为了活下去，只得忍受剝削，又租种了紅西樓姓翁的地主九十亩土地。天下烏鴉一般黑，最狠莫过財主心。几年以后，又被地主剝削得淨光，遭到了扒鍋封門、攆出村庄的同样命运。沒办法，我四叔王玉真和我弟弟王庆龍，就跑到麻埠山里，参加了紅軍。不久紅軍到了我們家乡，为穷人办事，我們真是說不出有多高兴！可是紅軍北撤以后，李家圩地主四胡子李松泉，知道四叔和弟弟参加了紅軍，就帶人抄了我們七次家，杀死了四孀和她的四歲的女儿。弟弟王庆龍

回家換衣服，不幸和李松泉碰了个对面，也被逮去杀掉了。以后，四叔王玉真随紅軍来家乡活动，被坏人出卖，也遭到了李家圩地主的杀害。当时，我被吓得不敢回家，逃到了河南。

随紅軍走的，走了，逃跑在外的，不敢回来，地主的地荒了，就想出了鬼点子，叫龙潭区伪警滿街打鑼，要大家回来，說回来不犯法。有一些人因为在外实在没办法，陸續地回来了，我也跟着回到了家。回家后，看到家里弄得一場糊塗，要啥沒啥，怎样生活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姑父陈之厚来到我家，他劝父亲租李家圩地主的地种。姑父也是穷人，他女儿的公公李其關，是李家圩的看司，算起来，也是我們家的一个拐弯亲戚。父亲听了姑父的話，开始不敢种，他知道李家圩地主的租子重、刑罰多，他也亲眼看見过有許多穷人，无故地被李家圩地主害死了；尤其是自己的兄弟、儿子被李家圩地主杀害，这是世仇，哪能給仇人种地呢？可是，又想不出別的法子，陈家土地不給种，翁家上地也沒种成，而这一带的土地又大部分是李家圩地主的，不种他家的地，去种誰的呢？再說，有李看司这門“亲戚”，也許要好些。

这真是：明知老虎要吃人，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往虎洞里钻。在一个秋雨茫茫的下午，父亲带着借来的十块大洋，买了点糕点礼物，来到了李其關家。李其關見到錢和礼物，两眼笑得眯成了縫，答应替父亲向李家圩地主求情。就这样，我家种上了李家圩地主的一百亩土地。

押金交不完，租課重如山

李家圩地主的田地財產，都是靠烧杀搶掠霸占和殘酷剝

削得来的。他們对穷人的剝削花样，真是說不尽。我家进庄第一笔被剝削的錢就是“代头”。这代头，就是佃戶进庄預交給地主的“押板金”。我家是十月写租約进庄的。李家圩地主規定，租十石种的佃戶，第一次要交三千串代头錢，交一千串錢給地主狗腿子們做“进庄礼”。父亲卖东西、东貸西借，好不容易才把这笔錢湊足。哪知道这并不算完，李家圩地主还規定“代头錢三年两头烂”。我家进庄的第三年，地主就說，交給他的三千串代头錢，已經烂掉了一千串，逼我家再补交一千串錢，要不交，就是违反租約，就要扒你的鍋，撵你滾蛋。佃戶李亚先、李松先弟兄俩，就是因为沒按时补上被烂掉的代头錢，一个被李家圩地主活活打死，一个被酷刑害死。我家怎敢不交呢！十四年中間，我家光被烂掉的代头錢就有五千串，加上第一次的三千串和一千串“进庄礼”，就被无故地剝削去了九千串錢。

李家圩地主从来不让穷人过好日子。当他看到你能吃两个菜窝窝、喝頓稀粥的时候，就紅了眼，想尽各种办法整治你，于是在代头錢以外又耍出了“調庄”的把戏。什么叫調庄呢？就是到了你身上有点油水可榨的时候，李家圩地主就借故說，你原来在老庄交的代头錢全部“烂掉”了，需要从这个庄子調到那个庄子去。地主让佃戶調庄，是为了进一步剝削佃戶。地主有的是生地，租給你种上几年，生地种成了熟地，可以多打一些粮食了，就把你調到另一个有生地的庄子上去，另立租約，重交代头錢；原来交的代头錢，就这样全部装进了地主的腰包。和我家同时租李家圩地的陈照兴，因为被李家圩地主剝削得生活无着，就弄了架織布机，农閑时織点布，补助点生活

費。李家圩地主就說他“家有布机头，抵上两犏牛”，接連把他調了三次庄。最后一次，說他在下沿庄田种的不好，要把他調到拐子庄上去。陈照兴不同意，李家圩地主就說他不听話，把他打得头破血流，搶去了他家的全部財物，撵他家出了庄。

李家圩地主用这种办法，不知道榨取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，慘害了多少劳动人民的生命！然而，这还仅仅是李家圩地主的一种剝削。李家圩地主还有更殘酷的剝削：租課。

李家圩地主的租課，說起来真是比泰山还重，比牛毛还多。地主的吃、喝、住、用、行，沒有一样不是来自租課。

先說粮課。粮課明說四成，实际五成、六成都不止。李家圩地主还規定：灾年不减，丰年照加。我家租种一百亩地，每年規定稻課三十石，麦課五石，黄豆、秫秫、山芋、綠豆等課五石。这算底課，不論灾荒多严重，別想求地主减一粒，就是餓死也得照数交；可是遇到哪年雨水較好，地主就要在这底課上再加三石、五石。我家种了李家圩地主十四年地，年年只能落个搶場飽；遇到灾荒年，受得那个罪更沒法儿說了。

再說副課。副課的名堂可多了。李家圩地主規定：种他十石种，一年要交草課四万斤。因为庄稼人要喂牲口，便折銀洋三十元，当时米是三角多一斗，得要十几石粮食錢。还要十斤皮棉的棉花課，二到五斗芝麻的油料課。此外还有家具課：扫帚六把，勺子七把，鍋盖两个，刷把若干；羊課：一头四十斤（李家是二十两一斤的秤）重的山羊；鵝課：三只三十斤的母鵝；魚課：鮮魚六十斤，每条都要十斤重的“渾子”；鸡課（或鴨課）：六只各三斤半重的老母鸡。还有什么藕課、菱角課、生瓜梨枣課……。真是地里长的，水里养的，树上結的，家里喂的，

沒有一样不要課。哪一样不够重量、不合規格也不行。

就这些嗎？不，还有。李家圩地主还規定有年节課、寿丧嫁髮課、人課。前两种課不細說它了，就是要佃戶給他家送礼。我着重讲讲人課。怎么交人課呢？按照李家圩地主的規定，象我們这个种十石种的佃戶，每年要有一个长期在李家做工，如修碼頭、筑围墙、盖房子、挑水、打碾、推磨……什么苦差使都要干，从正月十五上工，到十月十五下工，整整干九个月，不給任何报酬。

李家圩地主的活路重、生活苦、看管严，去他家做工就象犯罪的囚徒一样。早晚吃的是稀飯、臭腊菜，菜里蛆虫多得上把抓，中午干飯还不給菜。晚上睡觉打通鋪，只給盖一把碎草末。地主的狗腿子睡在床上，堵住門口，还定了三条紀律：一不准翻身，二不准說話，三大小便要报告。誰如果违犯了，他就給你加个罪名：“鬧暴动”或者“准备偷盜”，輕的痛罵，重的鞭抽、吊打。我們鸡叫头遍起身，鸡叫二遍上工，中午不休息，晚上点灯时才收了。夏天做活，累得、晒得黃汗淌、黑汗流，而地主却穿着綢衫，撑着洋伞，坐着凉椅，喝着香茶，指使狗腿子任意打罵我們。在我三十六岁那年，早上稀飯沒喝飽，抬石头垒牆头，抬到半晌午，肚子餓得咕咕叫，实在抬不动了，腿一軟，跌倒在地上。地主看到后，馬上就指使一个姓朱的狗腿子，拿皮鞭抽我的脊梁，直打得我滿背流血。别的穷朋友看我被打得实在可怜，一起向地主求情，才停了手。現在我脊梁上，还有一条一条的鞭痕。还有一个和我一起給地主干活的刘三樵的儿子，那时只有十七岁，个子矮，力气小，被石头压倒在地上，地主說他偷懶，先用皮鞭抽，后拿脚板踹，这孩子被踹得鼻

子嘴里冒鲜血，当场就死去了。

李家圩地主打死打伤了长工，有三种处理办法：能动的，爬回去；不能动的，家里来人抬回去，吃药、治疗地主不管；死了的，拖到乱尸岗上埋掉。但有一条，不论被打死打伤，佃户都要来人换，不准不来。十四年中，父亲、哥哥和我，因被打伤，相互轮换过五次。李家圩这个地主家族，究竟剥削了多少穷人的劳动力，又有多少穷人死在他们的残酷毒打之下，是谁也搞不清楚的。

李家圩地主的这些租课，压得我们穷人实在喘不过气来。可是李家圩地主的剥削，并没有到此为止。

层层剥削关，穷人遭磨难

李家圩地主为了剥削佃户，养了掌柜的、看司、跑庄的等许多狗腿子。掌柜的是给地主在家管账、出门要债的。看司是给地主讨地租的。名为讨租，实际上是逼佃户命的。这些人每年夏秋两季，到佃户家来两趟。他们来时，先要庄头（每个庄头，管方圆十几里以内的一二十户佃户）给佃户下通知，要佃户为看司做十碗八碟上等酒席，泡南山香片茶，准备州里皮丝烟，并且要到三里路以外去迎接。看司到家后：先是片茶、糕点、水烟，后是鸡、鱼、肉、蛋酒席，再是瓜果梨枣。夏季要吃西瓜拌红糖，秋后要吃白糖拌嫩藕。另外还有“两条规定”、“三大戒律”和“四不吃”。两条规定是：一、佃户要给看司跑路钱，名为“酬劳费”，十石种的佃户，每次要给大洋十块；二、看司坐睡，佃户要侍候搧风、打蚊子。三大戒律是：一要大人笑脸相待，二不准小孩哭，三不准佃户喊狗。按地主的说

法，佃戶不笑，是對地主不禮貌；小孩哭，惹人心煩，影響“養神”；佃戶喊狗是罵看司。所以看司來到佃戶家時，佃戶只得小心翼翼，一切照辦。四不吃是：不按規定做的菜不吃，碗數不夠不吃，茶不合口味不吃，房間不干淨不吃。佃戶如果違犯了其中任何一條，就要受各種折磨。

我三十五歲那年，大看司李介中，帶了六七個人到了我家。我家雖然已經被李家圩地主壓榨得只剩下一些破爛和一头黃牛、一口豬了，可是還東湊西借照規定招待了他。最困難的是沒有借到大洋，只借到十元紙幣。我把紙幣遞給李介中，他奪過去一甩多遠，沒頭沒臉地打了我一頓，氣恨恨地就走了。庄頭拾起了紙幣，趕快追上去，好說歹說，他才收下了，可是還說，回去要稟告他家地主老爺。我一聽，這可不得了，隨後又忍氣吞聲地把那口豬，通過庄頭喬四爺送到了李家圩，不知說了多少好話，賠了多少不是，才算了結了這場禍事。

至於跑庄的，一年不知要到佃戶家多少趟。每趟除了雞魚肉蛋招待外，按規定一年夏秋兩季，還要給他們“草鞋費”，每次多則十元，少則五六元。

一個佃戶，一年有多少收入呢？除了租課，再加上這些費用，受得了嗎！受不了也得受。這樣的剝削也還不是最後的，最後還有三道關要過。

李家圩地主派狗腿子把租課催齊了以後，就由他們押着往圩子裏送。這時，如同逢會趕集一樣，馱馱車推的，人挑人背的，川流不息，要持續幾個月。佃戶一年辛勤勞動的果實，就象江河里的水一樣，流進了李家圩。

李家圩地主規定，佃戶的秋季租課要一趟交清，每到這



佃戶一年辛勤勞動的果實，就象江河里的水一樣，
流進了李家圩。

时，佃戶們的心都是焦的。我家秋季租課，不算別的，光糧食就得三四十石，一趟交齊，要多少人力啊！請人送租，吃飯花費要由佃戶拿。這且不說，地主还把着三道關，關關都要“買路錢”。

頭一道關是登賬關。李家圩地主規定，佃戶往李家圩送租課時，离圩子三里路就得停下，由佃戶一人去登賬。如果不這樣，車子推進了圩子，或背、挑着糧食進了圩子，就說你冒犯虎威，擅自闖入，沒收了你的租子不算，還要遭到毒打。为了不惹下這場禍事，佃戶們只得照辦。在登賬這一關上，佃戶要拿出五元到七元的“攘筒子”錢。如果不給這筆錢，管賬的就說他事情忙，沒時間，車子还得推回去。這樣耽擱了時間且不說，地主還要扣你一個帽子：“交租不按时”，又得闖下大禍。

二道關是量斗關。這一關也得出五到七元錢，名為“灰土錢”。意思是說，“斗把子”在量斗時，糧食里的灰塵沾上了他的衣服，扑髒了他的嘴臉，要用錢來補償。要是不給這筆錢，他就用三個辦法刁難你，一說量不過來，過几天再來；二說糧食不干淨，要你把糧食推到場上晒了又晒，揚了又揚；三是即或量你的，他把糧食猛地倒進斗里，拍了又拍，加了又加，一斗就裝上了一斗五。李家圩地主的斗，本來就是加五斗，這樣一來，又得加五。在我三十四歲那年，因給“斗把子”的錢少了，他就借口灰土大，硬叫我把糧食弄到東場上晒了三天，揚了五次。其實，交租的糧食哪個敢不弄干淨，這只不過是逼你拿錢罷了。

第三道是進倉關。這一關要不給錢，就得給東西。要是不給，管倉的就用兩個法子來治你：一是不開倉，叫你在倉外

蹲上三天三夜；你在那里受餓挨冻且不說，夜里圩兵巡邏还說你是坏人，把你吊起来毒打。二是开仓叫你給他們翻粮堆。翻粮堆就是把門跟前的粮食翻到后面，堆到仓頂。进过李家圩地主仓库的人都知道，他每个仓库都有多少万斤粮食，这样由仓前翻到仓后，由仓底堆到仓頂，得多少个劳动力，多长的时间啊！为了順利通过这一关，佃戶們又得拿出两三块钱，或者送相当价值的礼物。十四年中，我家光在这三道关口上花的錢就不知有多少！

家破人又亡，血仇深似海

李家圩地主通过这些剝削手段，使自己成了“双千頃”的大財主，作威作福，但仍然不滿足。他們有一条家規：不杀穷人起不了家。就在这条家規的指点下，不知有多少人家被弄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！光我知道的就有王永清、王庆凱、刘名怀、宏井厚、李寿山、王国成、陈普昌、郝海波、殷可亮、刘三樵等十个佃戶，因交不起租子，死在李家圩地主的殘酷的刑罰之下，他們的家庭被弄得四分五散，无以为生。我虽然僥幸沒死，但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。

我三十六岁那年，因为大旱，只收了三十多石粮食，不要說自己吃了，連留种子、交租課都不够。没办法，只得向地主求情，暫欠他五石租課。李家圩地主的利息很重，欠一石租，一年就长成三石，到了我三十九岁那年，五石租就长成一百三十五石了。李家圩地主看我家欠的租課太多了，便来逼租。我家根本沒粮食，拿啥交租呢？沒的交，就把我父亲綁进了圩子。到圩子后，六胡子李希梁的婆娘，指揮狗腿子把我父亲吊

在屋梁上，用带着六个疙瘩的馬鞭子抽。父亲的胳膊被吊断了，身上的皮肉被打得稀烂，昏死了过去。地主把他弄醒过来，又灌辣椒水，叫他坐“老虎凳”，最后又把我父亲捺到磔头上跪着，小腿上擱上土枪筒子，一头站三个人压，直压得我父亲肉开骨头劈，又昏死过去，才被扔到圩子东門外。我家得了信赶快去抬，只見他老人家渾身血肉模糊，一点人事不省，抬回家，沒过两天就死了。

父亲的尸首還沒抬出門，李家圩地主又派人把我哥哥綁去，也打得半死不活，扔出了圩子。我家里人把哥哥抬回去后，他拉了十天血，也死了。

这时，我在圩子里做苦工，家里剩下的十来口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沒有一个掌事的，我嫂子經人劝說招了个女婿，名叫尚同軒。尚同軒到我家一个多月，地主知道了說：“尚同軒能結起亲，总有百十石粮食还租吧！”尚同軒是个穷帮工的，娶不起人，才来到我家。李家圩地主把尚同軒叫去，硬逼着他交出百十石粮食。尚同軒說沒有。他們又同样地吊、打、压，最后看尚同軒被折磨得不能活了，才把他扔到圩外。我家找人去抬，抬到半路上，他就死了。

李家圩地主看到我家的人被打死了几口，租子还是沒着落，就謀算要我們弟兄的七个孩子。我听到风声，抽空回家告訴了嫂子和老婆。因为我常看到圩子里的丫环、小子挨打受罵，被折磨死，怎忍心把自己家的孩子扔进火坑呢！我們商量着，把七个孩子暂时分送到亲戚家里。果然，沒过两天，李家圩地主就綁走了我老婆，逼着她拿孩子抵租。我老婆不答应，他們又是吊起来抽打。我老婆已怀孕三个月了，怎能經得起

这样吊打呢！被打了有一顿饭工夫，她就流产了，血顺着裤腿往下流，地上淌了一大滩，人也昏死过去。最后地主又把她扔到东门外。到底穷人向穷人，帮工的老刘妈连忙跑去救，把她掉在裤襠里的血胎儿拿掉，又回去烧了点姜汤，找了一点止血药，给她灌下去，才慢慢醒过来。抬回家以后，淌血，拉血，没钱治，过了半个月，还是死了。

人被打死了，种的麦子被地主割去了。稻子熟了，地主又派人来割。我母亲干生气不敢言语，加上没吃的，病倒没两天也死了。

地主割了稻，又拉走了我家的牛，扛走了我家的犁，抢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，还扒了锅灶，封了门。我嫂子在外，带着七个孩子，住在人家的门楼子底下，吃没吃，喝没喝，冷风吹，寒雨打，过了两个月，也离开了人世。

我一个男人，怎么带七个孩子呢？实在无路可走，狠了狠心，把四个女孩子送给人家做童养媳，把三个男孩子送到亲戚家，剩下我孤身一人，讨饭过活。

就这样，李家圩地主还不死心。十月里，地主派人找到我，逼交欠的鸡鸭鹅鱼课和草课，还要两石米的下庄礼。我交不出，六胡子的婆娘要我拿七个孩子抵租课和下庄礼。我说，女孩子送给婆家了，男孩子抱给人家了。狗婆娘听了把眼一瞪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粮没粮，钱没钱，要人又没人，难道能便宜了你！”说罢，她就叫大管家李介中，拿起马鞭子抽我，一鞭一道血印子，头、脸都被抽肿了，眼睛睁不开。李介中还摸起一把刀，一下砍到我的腰上，血呼呼地淌，我立时昏了过去。

等我醒过来，地主婆娘也吃过了饭，又来逼我交孩子。我



地主婆娘指使大管家李介中和其他五个狗腿子，把烧得通红的犁尖，套在我的脚上，说叫我穿“红绣鞋”。

說什么也不答应。地主婆娘就指使李介中和其他五个狗腿子，一个抱我的头，两个架我的胳膊，两个拽我的腿脚，李介中拿火剪夹着烧得通紅的犁尖，一下套在了我的脚上，說叫我穿“紅綉鞋”。我只听到吱啦一声，心螫了一下，就啥也不知道了。

地主把我扔在圩子东門外，还是老刘媽把我救了过来。我渾身疼得不能动，心里象火烧一样，腿肿得有小桶粗，五个脚指头烙掉了四个半，直往下淌黑血水。

后来，我妹夫找人把我抬到他家，几个月不能下床，烂了二三年，老不合口。没办法，我狠着心，忍着痛，把露在外面的两节骨头掰掉，才慢慢地长好。但从此我右脚上的五个脚指头都成了半截子。

我們一大家子人，就这样被李家圩地主害死了十几口，在老一輩里，只我一个人死里逃生，活了过来。这血海深仇，我一輩子也不会忘記！

一九四九年，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队伍解放了我的家乡，我这个从旧社会刀山上活过来的人，翻了身，享受到了人間的温暖。

党领导我們斗倒了地主，报了血海深仇，分到了土地。两年之后，又领导我們組織了互助組，以后发展成初級社、高級社，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，生活越过越好。

現在，我的儿子和两个侄儿都結了婚，安了家，有了孩子。儿子和侄儿都是生产队的好社員。儿媳妇是本队生产队长，共青团員。我在生产队里当飼养員。两个女儿和两个侄女，也都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在旧社会，我家从来不知道学校是啥

样子，现在我侄媳是高小毕业生，其他的人也識字了。

新旧两个社会，真是大大不同。解放十五年来，沒有人罵过我一句，打过我一掌，干部見到，总是喜笑顏开，叫我“王大爷”。在旧社会，因为受劳累受折磨，我得了严重的疝气病，无錢治疗，长期受罪。在新社会，人民政府把我送到医院里，免費治疗，医生和护士們待我胜过亲人。做梦也沒想到，我这个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穷人，能有这样的幸福！每想到这里，感激的泪花，就不由得流了出来。

現在，有时閑着无事，我抱着孙子，把孩子們叫到跟前，就給他們讲讲家史，讲讲我家受了李家圩地主多少害，讲讲旧社会穷苦人怎样受剝削和受压迫，要他們記住过去的苦，要他們知道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把我家救出火坑，給我家带来了这样的好光景。要他們一定听毛主席的話，坚决跟共产党走，时刻不忘階級斗争，努力生产，多打粮食，支援国家建設，把祖国建設得更加美好。

王庆堂 口述

甄长祿、楊立明 整理

选自安徽人民出版社《血泪的控訴》

逼命的地租

解放前，我家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垧，祖祖辈辈给地主扛大活，一直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。到了父亲这一辈，苦熬苦撑，才在荒地上刨出一块巴掌大的宅基，搭了两间破草房，算是有了藏身的地方。以后又在房后开了一小块竹林坪和一亩多干巴地。全家四口人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累死累活，到头来还是吃没吃的，穿没穿的。没办法，父亲一狠心，硬着头皮去租地主吴有新家的地种。

租吴有新家的地得先拿钱、粮作押金，我家没地方去弄钱弄粮，只好多说说好话。好说歹说，吴有新见我父亲的身板挺结实，就规定父亲每年给他干四个月的零活，才答应租给我家五亩地。租了他家的地，就象一条铁锁链子套住了父亲的脖子，再也摆不脱了。父亲给他干活都是农忙时间，干一天比在家里干两天还累。他家开个粉房，每天鸡叫两遍就起床推磨，要磨二十五斤豌豆的粉才吃早饭，晚上吃了晚饭还要挑二十担水，两头不见太阳，这样就把自己家里的活计耽误了。

有一次父亲给他磨粉，桶里的粉漫了出来，吴有新看见了，气汹汹地上去就是两棍子，嘴里骂着：“狗东西，你眼睛瞎！”父亲被打得两眼直冒火星，可是满肚子怒气只好压在心里。这还不算，只要吴有新出门，或是有来往客人，就得给他

出差、抬轎，我父親簡直成了他家的長工。可是我家租他那五畝地，打下的糧食，除了交租，什麼也沒剩下。吳有新還給租地的窮人家立了很多規矩，什麼谷黃了要請嘗新酒，收割庄稼要請收割酒，過年過節要送禮，送少了還不行，動不動就拿“退地”威脅。我們家窮，沒有挂面、雞、肉、酒，就要賣掉糧食去買。這樣不等糧食收下來，就早讓他給刮下了。父親母親一年四季，泥一把水一把，拚命地干，結果全家人還是糠菜塞肚子，整年穿不上一件象樣的衣裳。

就這樣的苦日子過得也不太平。一九四五年，家鄉遭了旱災，我家租的是山嶺上的地，庄稼都旱死了。吳有新是個死人身上也要榨出三斤油的家伙，他租出的地，豐年要加租，荒年不減租，這年我們收的糧食全交了租還欠他二斗。這二斗租可要了我們一家人的命啦！吳有新以利滾利的辦法，滾了四年就把我們家的宅基、竹林坪和土地全部奪去了，可是那二斗欠租，還是還不清。

吳有新看我家再也榨不出油來了，就在我父親身上打了主意。一天，他大搖大擺地闖進我家，一進屋就說：“何官儉！你一家人我給你養活了好幾年，別的不說，租子總該交了吧！”

他的管家蕭長田把算盤珠子撥拉了几下，走到父親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不多不少，正好五石。”

父親一听簡直不相信自己耳朵，戰兢兢地問道：“啊！多少？……”

蕭長田故意伸出五個手指頭，觸到父親的眼皮上，大聲喊着：“五——石——！”听了這個數，我們全家人吓得直打哆嗦，父親顫抖地說：“吳先生，這幾年你是知道的，天老爺不睜眼，硬

是沒收着糧呀，孩子們整天餓的哭，家里一點糧食也沒有啊！”

吳有新從凳子上站起來慢條斯理地說：“這麼說，我那五畝地倒是該你白種了。”

管家又迎上來說：“何官儉，我來當個中正人，看在這些孩子的身上，你再想想法子，租子往後推幾天再拿。”說完他倆轉身就走了。

當時我父親母親還以為吳有新發了善心呢，可是沒過幾天，吳有新就打發他的兒子把我父親叫去了。父親一去幾天沒有回來，也沒聽人說到哪裡去了。母親和我們都很着急，東打听西打听，才知道父親被吳有新賣了壯丁，他從中撈了一大筆錢。這真象一聲晴天劈雷，母親簡直變成了瘋子，整天哭的死去活來，幾次昏過去。哥哥和我抱住母親：“爸爸呀！媽媽呀！”哇哇大哭。母親想去告狀，可是一想到“衙門口朝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”這句話，心又涼了。沒法子只好把眼淚咽到肚子里。吳有新把我父親賣了壯丁沒過幾天，又把租給我們的五畝地抽了回去，還逼着我母親還租。黑心的吳有新就這樣吃人不吐骨頭。

土地沒有了，父親這一去不知是死是活，我們年歲小不懂事，還向母親要吃的，母親整天愁眉苦臉，眼淚汪汪。

一天，母親忽然打起了精神，洗了臉，梳了頭，從早上就忙活，也不知從哪兒弄來一碗米，要給我們做大米稀飯吃。米下了鍋，叫哥哥燒火，母親坐在門口給我縫補破褲子。我什麼也顧不得了，只是死死圍着鍋台轉，鍋里咕嘟咕嘟冒氣了，我把鼻子湊近鍋蓋上聞，說：“飯，好香啊！”當時我只想吃飯，可不知道母親為什麼要給我縫補衣服，為什麼要給我們煮飯吃。我

向哥哥說：“我要吃兩大碗！”

哥哥說：“小孩子，還吃那麼多！”

我不依哥哥，噘着嘴向母親嚷：“媽呀！你看哥哥光朝我瞪眼！”

哪知母親心里有事呀！她一邊縫補褲子，一邊抹着眼淚說：“給你吃，等會媽給你盛兩大碗，讓你吃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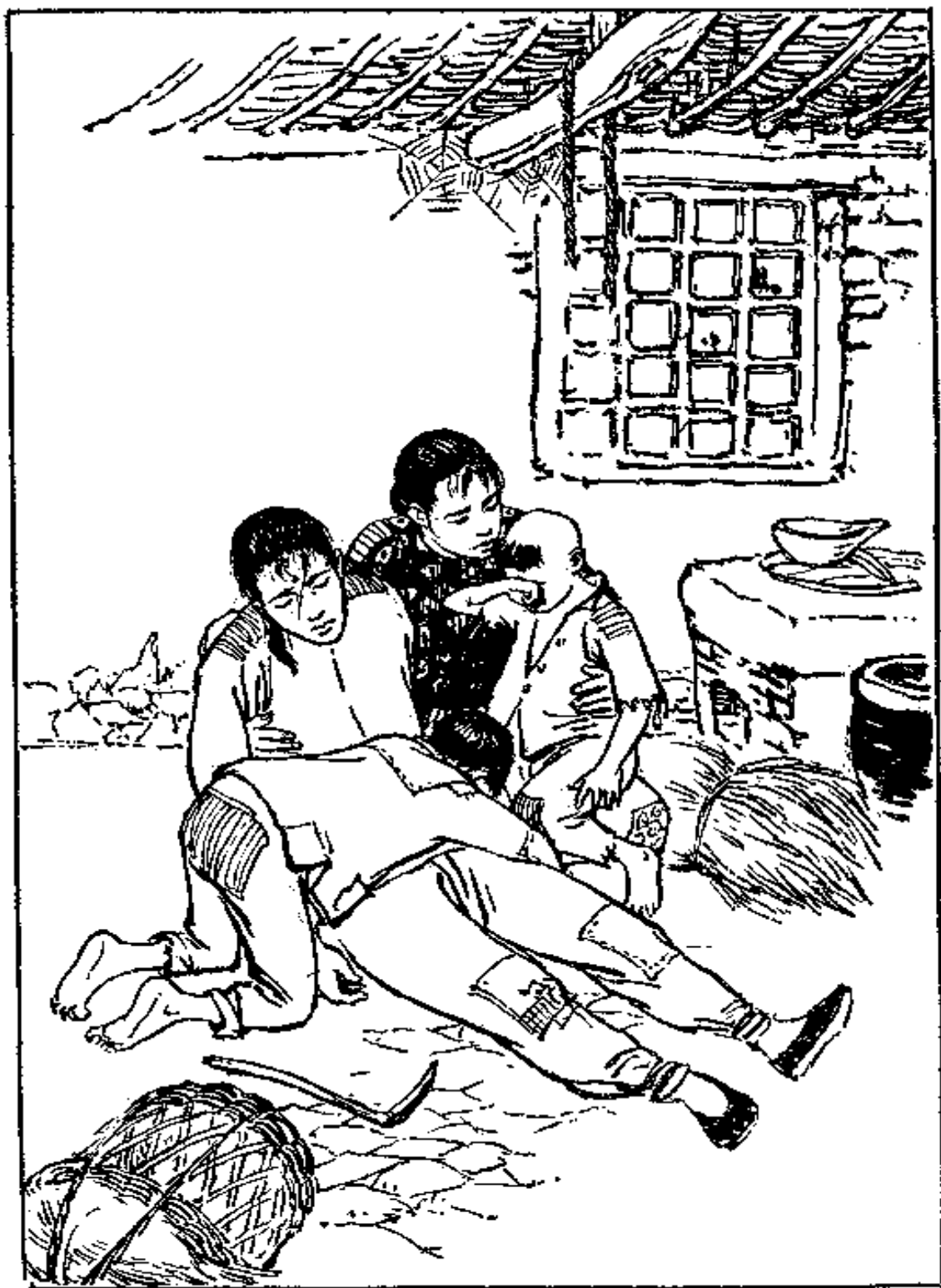
飯煮熟了，母親給我和哥哥盛了碗干的，她只盛了碗稀湯；她看我們大口大口地吃，自己却一口也不往嘴里送。

哥哥很懂事地放下碗，望着母親說：“媽媽你怎麼不吃？”

母親說：“好孩子，你們快吃！我不餓。”

等吃完了，母親把我們叫到跟前，先抱住我，用嘴親了親，然後用兩隻眼睛望着我說：“小娃子，你要聽哥哥的話，哥比你大，可別淘氣呀！”說完她又拉住哥哥說：“你弟弟小，要好好照看他啊！”母親一面說着，一面流淚。停了一會兒，母親又說：“你們吃飽了，給媽媽干點活去！”我們背上背簍，到外邊去撿柴，母親把我們送出門，看着我們走了老遠才回去。

我們哥倆出去不一會兒，就聽家里嘈嚷起來，有人跑來喊哥哥回去，我們不知出了什麼事，背起背簍就朝家跑，一進門，東院李大嬸就指着哥哥說：“你們這些傻孩子，怎麼這樣不懂事，不會跟着你媽媽點！”她說完，把我抱住。哥哥一看，母親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急忙丟掉背簍撲上去，趴在母親身上，“哇”的一聲大哭起來。我看哥哥哭了，也在李大嬸怀里“媽呀！媽呀！”哭起來。早上母親又給我們做飯吃，又給我補褲子，我還高興呢！誰知道她被地主逼得無路可走，竟上了吊。當母親被乡亲们用姜開水搶救過來的時候，我和哥哥一下子撲到她的



早上母亲又给我们做饭吃，又给我补裤子，我还高兴呢！谁知道她被地主逼得无路可走，竟上了吊。

怀里，娘三个抱头大哭了一场。哥哥象懂了点事，他一边哭一边抱着母亲的脖子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我和弟弟跟着谁啊！爸爸要是回来了，上哪儿去找我们哪！”

母亲搂住我，抚摸着我的头，又用手拉住哥哥说：“孩子呀，妈妈糊涂，怨妈心狠，这都是那黑心的吴有新逼的！妈舍不得你们，妈再也不离开你们了，咱要等你爸爸回来，再苦妈也领着你们活下去……”

在家再也活不下去了，为了活命，母亲只得一手领着我，一手提着要饭棍，带着哥哥离开自己的家逃亡要饭去了。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家乡解放，我们的苦日子才熬出了头。父亲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过来，全国解放以后也复员回家了。土改时，地主吴有新也受到了人民政府应有的惩罚。

现在我们家可好了，有吃有穿，去年家乡受了旱灾，母亲有了病，书记和生产队长，三天两头上门问候。母亲生病没出工，社里秋后还补助了工分，分了粮食。后来，母亲病好了，抓着书记的手，流着热泪说：“要是在旧社会，我们骨头早就烂了，这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呀！”

何明贵 口述

刘德伟 整理

选自吉林人民出版社《牢记血泪仇》

三代苦难

我老家在河南省林县赵老安村。从我一懂事，就跟娘下地干活。娘在前边刨地，我在后边打土坷垃；娘在前边锄地，我在后边间苗。到了晌午，娘坐在地边上，累得连糠窝窝也吃不下去，光是大口大口地喝水。有一次，我问娘：“我爹呢，怎么也不来帮咱们锄锄地？”我娘听我问爹，立刻哭了起来。

欠下一笔租债

为什么一提爹娘就哭，这得从头说起。我家几辈子贫穷，只有二亩薄地。到我爹这一辈，家里人口多了，生活更困难了。为了养家糊口，爷爷租了大地主杨振岗几亩地。一家人受苦受累不说，遇上了个坏年成，还拖欠了杨振岗一大笔租债。杨振岗外号叫“黑乌蛇”，他见我家还不上租债，就要夺我家那二亩地。我爷爷死活不肯卖这点祖业，可又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得去杨家扛活，以工抵债。爷爷白给地主干了二十多年活，租债也没还清，被活活累死气死了。爷爷临死的时候嘱咐家里人说：“不要再到杨家去，不要再端杨家的饭碗。”可是爷爷死了，家里那二亩地，还是不够吃，万般无奈，我爹又租种了杨家的地，结果又欠下了租债，又得去他家扛活抵债。就这样，我家一代一代地给杨家当牛马，翻不过身来。

我爹給地主楊振崗扛活抵債，就象賣給他一樣，家裡的活什麼也不能干。我家的房子又小又破，一下雨就漏，人活遭罪，破爛東西也沒處放。奶奶說了不知多少次，叫爹抽空回來修補修補，楊振崗就是不讓。每逢遇到這種情況，奶奶就生著氣對我說：“小金保，你們兄弟要爭口氣，記住你爺爺的話，不到楊家去，不端他家的飯碗！”說著說著，一家人都哭了起來。

沒過多久，家裡又添了三弟全保。多了一張嘴，愁得我娘整天唉聲嘆氣。一天晚上，我爹回來，站在炕沿底下，看著我們兄弟三個說：“一代又一代啊，他們這一代還得照樣租地，欠租，當長工，永遠讓人踩在腳底下！”我娘看我爹神色與往常不一樣，忙問他怎麼了，但他什麼也沒說。那時候，我爹常和一些窮朋友來來往往，只要有人在窗外一叫，馬上就走，常常半夜裡還不回家，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麼去了。娘怕爹出事，整天提心吊膽。

爹被地主殺害

怕出事，偏偏出了事。那是一九二八年秋天，楊振崗當上了國民黨的區長，整天帶著一幫拿槍帶刀的人，明捉暗殺，殘害老百姓。十二月二十那一天，天剛亮，有人來叫門，嚷著說：“不好了，金保爹叫人殺死了。”我娘一聽，頭沒回，拉著我，抱上弟弟就往河灣跑。到那一看，我爹死的真慘：喉嚨被捅了一刀，肚皮也被劈開了，腸子流出一大堆。我娘趴在爹身上哭成了一團。那時候我六歲，銀保四歲，全保不到三個月，也都吓得大哭起來。過了一會兒，奶奶趕來了，坐在地上一下子就哭暈了過去。鄉親們連拉帶勸，好不容易才把奶奶和娘



我娘听说我爹被杀，立刻跑到河湾，一看，我爹死得真惨：“喉咙被捅了一刀，肚皮也被劈开了，肠子流出一大堆。

扶到家里。我們到家沒多会儿，楊振崗跑來了，他假仁假義地說：“啊呀！老李死了，真想不到。凶手抓住沒有？沒抓住我當區長的一定給你們抓到。老李和我打了二十多年交道，我不能瞧着不管。”喘了口氣，他又說：“這麼辦吧，沒棺材，我那里有現成的木板；缺錢，我先給你們湊點。”奶奶連連擺手說不要，我娘也說借了還不起。這時楊振崗把眼睛一瞪說：“你們是不是怕我這個區長訛人，嗯！”奶奶和娘吓得都不敢言語了。過了半晌，楊振崗派人送來一幅薄木板和十塊現洋，還帶來一張紙，讓我娘畫押。紙上寫着：“木板和十塊現洋折合糧五石，明年本利還清，到期不能還清，願將村南二畝地折歸楊家經營。”

楊振崗說要替我們抓凶手，其實凶手就是他。因為那時候我爹和一些窮哥們常來常往，他起了疑心，怕窮人抱成團跟他作對，就來了個“先下手為強”，指使狗腿子殺了我爹。他這樣做，一來是為了鎮住眾人，二來是為了乘機奪走我家二畝地。奶奶知道殺我爹的是楊振崗以後，想起一代代的血淚仇，又是氣又是恨，不久就死了。

爹和奶奶死后，剩下娘和我們兄弟三個，日子更難熬了。娘為種自家那二畝地和爹從楊家租來的那四畝地，每天都是天不明下地，天黑還不回來。鄉親看着我娘實在難，趕着牛來幫忙，說：“要是年成好，債是能還清，可吃的怎麼辦呢？”我娘說：“累死，餓死，也要把債還清，祖上留下的二畝地是命根子，說什麼也不能在我手裏丟了。”誰知老天爺不睜眼，一連三個多月不下雨，苗子又黃又瘦，還債的打算又落了空。我娘心里着急，也病倒了。

秋後，祖上留下的二畝地，被楊振崗奪走了，還搶走了我

家两口大缸，一个大盆，就这样也没还清他的閻王債。他又打发人叫我去給他家放羊抵債。我娘一听，肺都气炸了，含着眼泪罵道：“黑心腸的老黑烏蛇，租了你家几亩地，折磨死我公公，杀死我男人，霸占我家的地，还想坑害我的孩子，办不到！”可是，不去，楊振崗不饒。最后我还是到了楊家。

楊振崗家在南赵老安村，老远就能看見一个大哨楼。进了門，看家护院的一个个如狼似虎。后院老槐树上还吊着一根粗绳子，是专门吊打穷人的。我去了没几天，二伯父就被抓来了。他也是租种楊家的地，遭了灾，交不起租子，楊家要夺他的地，他不給。狗腿子把二伯父吊在大槐树上，一頓皮鞭，抽得他浑身是血，他还是不答应。后来楊振崗“开了恩”，不要地了，叫他給修房子。二伯父从来没干过这种活，結果从楼房上掉下来，活活摔死了。大伯父一家的遭遇更惨。不知因为什么，大伯父和楊家狗腿子爭吵起来，叫人家偷偷杀死，埋在山岩下，直到后来下雨发水，冲走了浮土，才找到尸体。大伯父的四个儿子，知道打官司也打不贏，丢下家里的房子、地，扶着老娘上了山西。天寒地冻，身上又没有擋寒的衣裳，大娘走到半路就冻餓死了。

当时我年岁小，听了这些事，又是恨又是怕，見了楊振崗，总是躲得远远的。但是你躲他，他不躲你。一天我赶羊回来，正碰上楊振崗从对面走来，身后还带着几个打手。他走到我跟前，瞪着眼瞧了我好一会儿說：“学会放羊了吧，拿鞭子給我看。”我把鞭子交給他，他掄起鞭子就抽，嘴里还罵：“打死你这个小杂种。”我气极了，爬起来問他：“你凭啥打人罵人？”他又狠狠抽了我几鞭子才說：“凭啥，就凭你是你爹的儿子。”

說完，扔下鞭子，大笑着走了。

我背上被打的腫得老高，夜里睡覺都不能躺下，過了半个月，脫了一層皮，才好了。三天兩頭挨打，我實在受不了這個罪，偷偷跑回了家。娘聽說我經常挨打，攬着我哭着說：“兒呀，咱們的命苦呀！在家實在活不下去了，咱也上山西逃荒吧！”

天下烏鴉一般黑

我八歲那年開春，我們一家逃荒奔了山西。我娘抱着三弟全保，背着破爛衣裳。我和二弟銀保提著籃子罐子，夾著打狗棍子。一邊討飯，一邊趕路。沿路經過平順、壺關、長治，最後才流落到長子縣的裴家莊。到了裴家莊，几戶早逃出來的林縣鄉親勸娘租几畝地種。娘一想起租地的下場就害怕，可是不租地又沒別的法子，最後娘狠著心租了大地主劉德清四畝地，每畝地租六斗。那時候，平常年景，一畝地能打一石糧。娘說：“咱們加把勁，要是能收一石二三，總比在林縣強些。”哪知去地里一看，一家人都傻了眼。荒草能藏住狼，土又都是不長庄稼的紅土，土里還夾著砂礫石塊塊。這地本來沒法兒種，可是已寫好了租約，沒法兒種也得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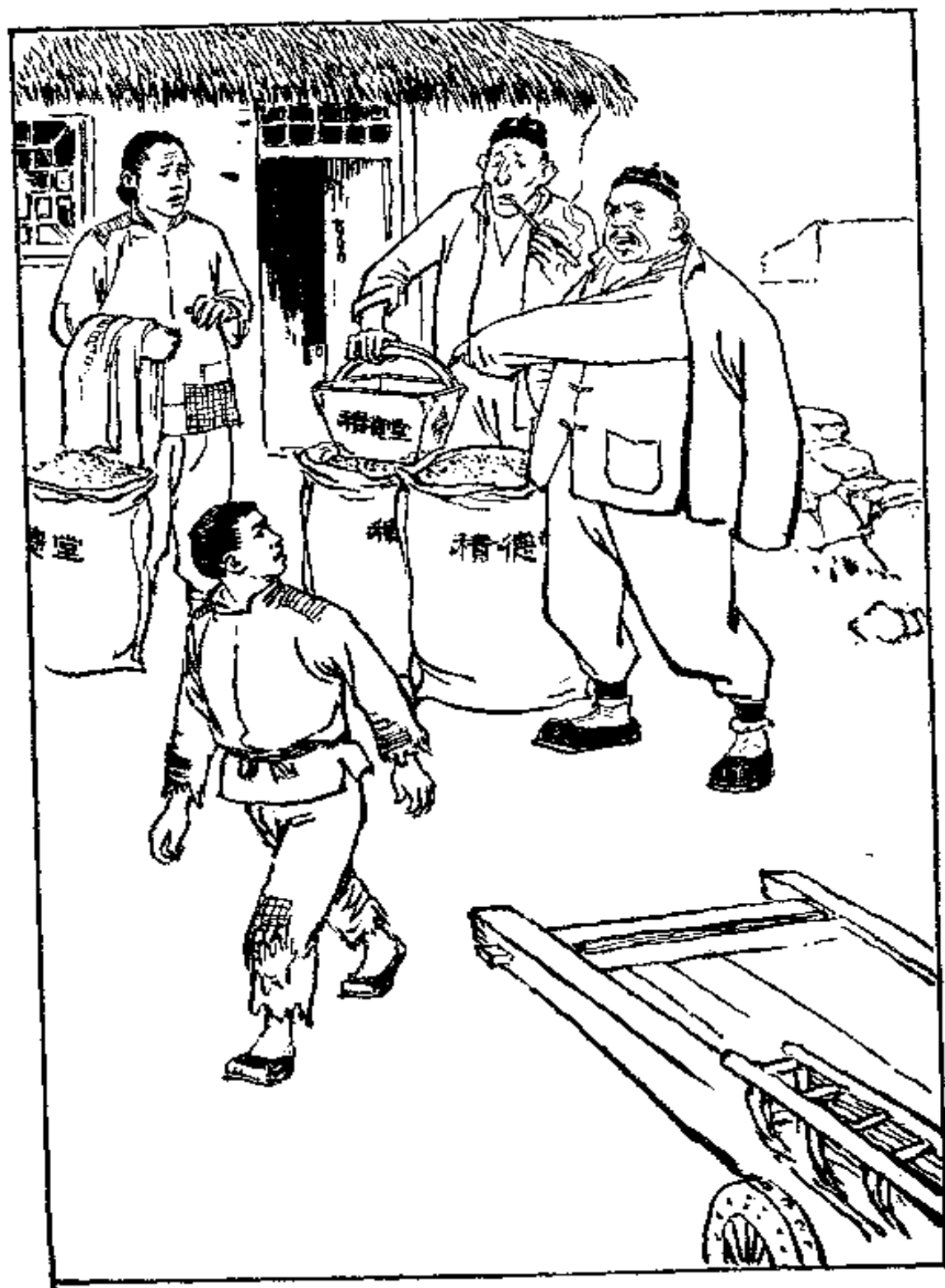
这几畝地可把我們娘几个累坏了。娘和我沒明沒夜的刨草根，刨的滿手血泡。小兄弟全保剛五歲，也整天跟著往外揀砂礫石。然後又拾糞送糞，整整苦幹了一個春天，庄稼苗总算長得不錯。到了秋天，一畝地收了八斗糧，娘說：“這回咱怎麼也要吃几頓干的了。”

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剛收罷秋，地主劉德清就坐著大車來收租了。我娘那敢怠慢，趕緊把準備好的二石四斗租扛出

来。刘德清拿出他带来的斗一量，二石四斗竟变成了二石一斗。我跟娘說：“咱借个斗再量量。”刘德清看我真的要去借斗，眼睛一瞪，凶恶地說：“回来！給我家交租就得用我家的斗量，这是老規矩。”我說：“我看你的斗不公道。”他說不出理来，抬手就要打人，多亏邻居連拉带劝，我才沒被他打着。娘怕又惹下是非，又給他补了二斗多谷子，才算完了事。交完租，我家剩下不足六斗粮，四口人一人合不到二十斤，連冬也过不去，可是官府照样要粮要錢，村里照样派这个費那个捐。我娘愁得叹气說：“走到哪儿也沒穷人的活路啊！”

年关快到了，刘德清又来村里逼租逼債。他走到我家門前說：“喂，老李家，那块地明年我自己要种，你們另外想办法吧！”这明明是見我們把地收拾好了，他想夺回去。我赌着气跟娘說：“不叫种就不种，累得一家七死八活，也落不下个啥。”我娘說：“好容易刨淨草根，生土种成了熟土，盼着明年多打点粮食，怎能不种呢？只是不知道刘家为什么要抽地。”邻居听我們娘俩說地主要抽地，忙过来問娘：“你还没給刘家送礼吧？逢年过节都得送，要不，他就抽地。”娘含着眼泪借了五斤面，买了二斤肉。小全保不懂事，見了肉，嚷着要吃，娘打了他一頓，他哭我娘也哭。

娘帶着我把礼物送到刘家。刘德清一見肉和面，忙接过去說：“礼无輕重，总算是对东家的一点心嘛。后岸那四亩地，你們要种就先种着吧，多下点力气，多上点粪，把地种好了，咱們两家都好嘛！”从此，一年四时八节，都要給刘家送礼。端午节送粽子，中秋节送月餅，年节送肉送面。每送一次礼，就消耗我家一个月的口粮，我們一家四口，就得光吃野菜，不吃粮食。



刘德清看我真的要去借斗，眼睛一瞪，凶恶地说：“回来！给我家交租就得用我家的斗量，这是老规矩。”

第二年，为了让地里多打几颗粮食，全家人下死力拾粪积肥，精耕细作。这一年收成不错，交完租子，吃了几顿干的。我娘说：“好好闹吧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！”转眼开了春，我们又往地里厚厚撒了一层粪。眼看要翻地了，刘德清在地头上碰上我娘说：“喂，老李家，今年这地我自己要种，你们另外想个办法吧！”我娘知道他又不怀好意，连忙央告他：“刘东家，我家又没欠租子，按时按节都送了礼，这地我们全家拚死拚活刚整治出来，你不能往回抽呀！”刘德清嘿嘿一笑说：“这可由不得你。地是我的，我想啥时种，就啥时种。明天我就派人来翻地。”就这样，刘德清不仅夺走了地，把我们上在地里的粪，也白白夺去了。

地被抽回以后，我娘又托人说情，刘德清才答应另租一块地给我们。这块地共有七亩，虽然野草、砂礓石不多，可刺蓬蓬不少，并且是下洼地，一下大雨，就涝得进不去人。我娘说：“七亩怕种不过来吧！”我说：“这哪是租咱地种，明明是叫咱给他挖泻水沟。不种它甭说，要种这块地，种一亩，种七亩一样得挖沟。”娘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不租地，没活路；租地种，一样活受罪。”

最后地还是种了。我们母子四人泥里水里挖了一道排水渠，又把渠岸垫成了平地。人家地里都下了种，我们还没翻地。眼看节令过去了，幸亏乡亲们帮忙，才把地犁了，下了种。到了第二年，刘德清见这块地收拾得象个样子了，他又抽了回去。我们家种了刘家十三年地，先后换过六块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有钱人的心真比蝎子尾巴还毒，比狼还狠。

特别是租种刘家壕墙那十亩地，我更永世忘不了。这块地在我们种以前，曾租给一个姓王的佃户，他种了一年，就赔

进去一头牛一头驴。我家租这地的时候，刘德清说：“这块地少收点租，一亩地就按四斗半。”我们兄弟三个大了几岁，力气增加了，整天拴在地里，跟野草打仗，刨的刨，拣的拣，累得半死，也没把草根子弄干净。小苗出来了，草也跟着钻出来。紧锄了几遍还是不顶事，秋后十亩地才收了四石粮，连交租也不够。托人央求刘德清给换一块地，他说什么也不答应。第二年又种了一年，打下的粮食仍不够交租。第三年是大灾荒的一九四三年，我家连稀糊糊也喝不上了。我们兄弟俩只好一个去打短工，一个去当铁匠。

越是灾荒年，地主越加紧向穷人逼租逼债。穷人还不起，他们就趁机夺田霸产。这一年，有许多穷人的地，变成了刘家的地；有许多穷人的房，变成了刘家的房。刘德清还高价卖粮，一斗米要七块现洋，乘机发灾难财。我家一没房二没地，刘德清也没饶过。腊月里有一天，他突然带人闯进了我家，坛坛罐罐弄了个底朝天，只找出五升细糠、三升玉菱。找不到值钱东西，他伸手就抢我家四口人伙盖的那条破被子。我娘和三弟拉着不放手，狗腿子上来就打。被子抢走了不算，五升细糠、三升玉菱也拿走了。

来了救星共产党

家里实在活不下去，我到安洋山去给人家放牛，刨地坡，过的仍是挨打受气的日子。没想到，红旗一飘，那里来了共产党、八路军，一下子天就变了。地主再不敢打人了，再不敢不讲理了。我活了这么大，第一次舒舒展展喘了口气。工作组的同志到地里找我谈话，见我光着脚，让我找主家要鞋，

主家乖乖給我做了双鞋。我工錢太少，主家咬着牙給我加了兩塊錢。我還亲眼看到那里開起了群眾大會，把不老實的地主斗得低頭認了罪，並且宣布：只許佃戶退地，不許地主抽地，還要減租子。當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心想：共產黨可真是窮苦人的救命恩人，要是早幾年到了長子，我娘怎會癱在炕上？要是再早十幾年到了林縣，我爹怎會被楊振崗殺害！我找到工作組的同志說：“你們快點到長子去吧，人們都活不下去了。”工作組的同志拉住我的手說：“對，長子要解放，全國都要解放。”他們還跟我說，將來還要實行土地改革，窮人都分到土地，再也不用交租子了。我听了心里簡直樂開了花。

八路軍的力量越來越大，劉德清吓得整天躲在家里不敢露面。窮苦兄弟天天盼望八路軍。沒過多久，日本鬼子投降，我們那一带就解放了。

一解放就實行土地改革，斗地主，分田地。我家分了六畝平川地，還分了劉德清七間樓房。在搬家的那一天，娘叫我兄弟買來一張毛主席象，貼在迎面牆上。又請來一個認字的，想寫一幅對聯配在兩邊。那人拿起筆來說：“寫上‘高高兴兴鬧生產，歡歡樂樂慶丰收’好不好？”娘說：“好倒是好，要按我的意思不如寫：‘佃戶不忘租地苦，窮人常想毛主席’。”那人說：“嗨！有了房子有了地，寫些高興的字眼不好，為啥偏要提那個‘苦’字？”娘對他說：“這租地的苦可忘不得呀！”我也對他說：“我娘叫你寫的是她心里話，你就照着寫吧！”從此以後，我娘就時常對着毛主席象和紅對聯說：“毛主席呀，毛主席，要不是您老人家，我們窮人怎會翻身，怎會有現在這樣舒心的生活！”娘也常對我們兄弟說：“要好好听共產黨、毛主席的話，要

永远記住租地种的苦处。”土改以后，政府号召青年参军，沒等別人动员，娘就让三兄弟参了軍。

我在党的教育下，阶级觉悟逐渐提高，一九五〇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以后，經過不断学习，又进一步懂得了毛主席要农民“組織起来”的道理，因此，党号召組織互助組，我就积极参加。一九五二年村里办起了合作社，我也头一个报了名。当时，有人对我說：“你家受了几輩子苦，好不容易才有了六亩地，一入社，你家不是又沒地了嗎？”我說：“你光看見六亩地不是我的了，可你沒看見社里几百亩地都是我們的。再說，地也只有入到社里才保險呀，不然，个人单干，說不定几年后又会被人家夺走。

公社化以后，不仅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了，而且社里还来了拖拉机。队里派我給拖拉机手帮忙，我坐在拖拉机上，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，心里真是痛快。拖拉机手老楊同志跟我打趣說：“老李！这土地連成了一大片，你还能找見哪块地是你的嗎？”我认真地回答他說：“老楊！早先我家連巴掌大一块地也沒有。如今呢，你只管开上走吧！这眼能瞧見的土地，全是我的，全是我們大家的。”

李金保 口述

岳峰、王田溪 整理

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《太行人家》